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区域贸易协定 能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吗

王 岚

摘要：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服务的作用愈发凸显，服务贸易的新形式丰富了区域贸易协定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渠道。本文从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两个维度分析了区域贸易协定对不同类型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效果和机制。结果表明：单纯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提高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度将显著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区域贸易协定可以显著降低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对最终需求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效应不显著。区域贸易协定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存在非对称性，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效应强于南北型。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可以通过减少监管分歧和货物贸易自由化效果外溢两条途径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则仅可以通过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外溢效应来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因此，中国应积极与发达国家开展高质量区域贸易协定谈判，通过提高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充分发挥其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

关键词：区域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成本；边境措施；边境后措施；监管分歧
[中图分类号] F7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670 (2022) 1-0020-17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Global Value Chain，简称 GVC）的不断深化，以协调货物、服务跨境流动为核心的传统多边贸易规则对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不适应性不断凸显。涌现出了以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herence）和监管一致性（consistency）为主要特点的，以“WTO+（边境措施）”和“WTO-X（边境后措施）”（Horn 等，2009^[1]）为主要政策工具的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 Trade Agreement，简称 RTA），也称深度贸易协定（Deep Trade Agreement，简称 DTA）。DTA 旨在实现五个领域的经济一体化（economic integration rights）收益，包括缔约方之间货物、服务、资本、人员以及创意更加自由的跨境流动（Mattoo 等，2020^[2]）。因此，RTA 的质量将直接影响缔约方在多广的维度和多深的程度上

[收稿日期] 2021-03-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制造业价值链的影响与对策研究（20YJC790137）”

[作者信息] 王岚：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电子信箱：lovelyclare2006@126.com

获得一体化的收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不同质量 RTA 对贸易的差异化影响是 GVC 赋予 RTA 政策效果的新特征。

边境后措施作为 DTA 的核心标志,是 GVC 分工催生出的制度产物,同时也是解决传统贸易规则对新分工体系不适应性的重要手段。它通过协调各成员方国内监管政策达到规制融合的目的,以防止成员方监管分歧给价值链运行造成不必要的障碍。更加重要的是,经过边境后措施调整的国内监管环境作为制度型公共产品,不仅适用于来自缔约方的服务提供企业,还会惠及非缔约方的服务提供企业(Baldwin, 2011^[3])。由此带来的外部性导致 RTA 效果会外溢到非成员方(Miroudot and Shepherd, 2014^[4]),从而缩减 RTA 给成员方带来的优惠幅度(preference margin),弱化 RTA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效果。因此,边境后措施作为贸易规则顺应 GVC 分工的产物,不仅成为 RTA 影响服务贸易的新手段,还会产生区别于传统贸易规则的新贸易政策效果。

在 GVC 分工中,制造与服务的交织融合导致测度服务在 GVC 分工中的作用变得愈加复杂。从增加值的视角看,服务业在商品和服务总贸易额中的比重将近 50%,远高于按照总值贸易计算的比重(WTO, 2019^[5])。这意味着有相当的服务通过嵌入在商品中实现跨境流动。Cernat and Kutlina-Dimitrova (2014)^[6]将这一新现象称为在 GVC 分工下,除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以及自然人流动之外的服务贸易第五种提供方式。因此,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带来的货物贸易政策效果对服务贸易的外溢效应是 GVC 分工赋予 RTA 货物贸易政策效果的新属性。

从国家层面看,扩大服务业开放,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有利于发挥服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的带动作用。一方面,服务贸易成本尤其是获取中间投入服务的自由化程度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Beverelli 等, 2017^[7]; 张艳等, 2013^[8]; Hoekman, 2020^[9]),服务贸易自由化会增加本国制造业中服务投入的有效供给,提高制造业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出口(孙浦阳等, 2018^[10])。另一方面,获取中间投入服务的自由化程度是影响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的重要因素,而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 GVC 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已经得到文献的普遍支持(刘斌等, 2016^[11]; 王岚, 2020^[12]; 戴翔等, 2019^[13])。因此,考察 RTA 对不同用途服务贸易成本的差异影响,对于如何通过 RTA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实现 GVC 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关于 RTA 对服务贸易影响的研究,多从服务贸易流量的维度展开,且结论较为一致,即 RTA 能有效促进服务贸易(Marchetti, 2011^[14]; 周念利, 2012^[15]; Guillin, 2013^[16]; 陈丽丽和龚静, 2014^[17]; 林僖和鲍晓华, 2019^[18]; 林僖, 2021^[19]等)。随着增加值贸易方法的发展与成熟,一些研究开始从增加值视角考察 RTA 对服务贸易的影响(裴长洪等, 2014^[20]; 刘洪槐, 2016^[21]; 林僖和鲍晓华, 2018^[22]等)。目前,考察 RTA 对服务贸易成本影响的研究极度匮乏。Miroudot 等(2010)^[23]对 2000—2007 年期间欧盟各国的服务贸易成本进行测算和计量分析,发现缔结 RTA 能够降低区域内部的服务贸易成本,但影响并不显著。Miroudot 和 Shepherd (2014)通过分析 2000—2011 年间 61 个国家的服务贸易成本,也得到了

相似的结论。龚静和尹忠明(2017)^[24]结论则认为RTA能够显著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与上述研究不同,Miroudot和Shepherd(2016)^[25]分别测度了最终需求服务和中间投入服务的贸易成本,并重点考察了监管分歧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以上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由于没有将RTA质量以及服务用途的异质性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未能全面评估GVC分工下RTA对服务贸易成本的综合制度效应。

基于此,本文在GVC分工背景下,从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两个维度,在测度不同用途服务贸易成本的基础上,考察了不同深度RTA对不同用途服务贸易成本的差异化影响,并从削减监管分歧和货物贸易政策外溢效应两个维度揭示RTA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机制和途径。与以往研究多从事后角度评估RTA对服务贸易规模的影响不同,本研究以服务贸易成本为对象,从事前的角度考察RTA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拓展:第一,服务用途维度上的拓展,考虑到了不同用途服务在GVC分工下的不同作用,分别考察了RTA对最终需求服务贸易成本和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第二,政策维度的拓展,考察了不同深度RTA和不同类别政策措施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第三,研究深度的拓展,从缩小监管分歧和货物贸易自由化外溢效应维度识别了RTA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机制和途径。

二、理论分析

监管分歧的存在会以沉没成本的形式给企业带来额外的固定成本(Kox和Nordas,2007^[26])。海外经营以及位于不同国家生产环节的有效联结是GVC分工区别于传统贸易方式的典型特征(Baldwin,2011)。服务提供企业到外国建立商业存在并从事后续的经营需要符合当地的法律规范,这种行为会带来合规成本(Compliance Cost)。在各国监管不一致的情况下,如果该厂商在不同的国家建立商业存在,那么就需要不停地担负合规成本,从而提升企业拓展市场的难度,提升服务贸易成本。Egger等(2018)^[27]对贸易成本分解的结果表明,贸易监管差异对服务贸易成本的贡献度达到17%,是仅次于运输和旅行成本(19%)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第二大因素。为了适应价值链分工的新特征,近年来越来越多的RTA将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引入谈判范围,旨在通过实现成员方贸易监管的一致性减少监管分歧给服务贸易带来的不利影响,有效降低服务提供企业进入不同市场时的合规成本。此外,以RTA为载体的国内监管协调对成员方服务贸易国内监管行为带来有效约束,确保服务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因此能够提高服务企业出口的确定性预期,并为双边服务贸易体制提供可信的制度保证(周念利,2012),从而降低缔约国服务贸易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1:监管分歧会提升服务贸易成本,提高RTA深度可以通过减少缔约方之间的监管分歧降低服务贸易成本。这是RTA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直接途径。

当前世界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成为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的典型特征,导致越来越多的服务是被蕴含在货物中或者以与货物捆绑的方式实现跨境流动,形成了GVC下服务贸易的新形式。这为货物贸易政策向服务贸易领

域的外溢提供了渠道 (WTO, 2019)。在国内生产环节, 特定行业产品价格的变化会通过垂直产业关联形成向上游和下游部门传导的“涟漪效应”。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高度融合的背景下, 如果一国降低进口商品的贸易壁垒, 就会增加本国对这一产品的需求, 从而刺激出口国该产品生产部门对上游中间投入服务的需求, 变相促进了这部分中间投入服务的跨境流动, 并最终体现为服务贸易成本的降低。在跨境流动环节, 作为“贸易-投资-服务综合体 (trade-investment-service)”的 GVC 分工, 会使服务贸易跨境不仅要受到服务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 还会受到货物贸易壁垒的影响。有研究表明, 货物贸易壁垒的提升会显著提高零售和批发服务的贸易成本 (WTO, 2019)。因此, GVC 分工背景下, 服务贸易成本是服务跨境提供成本和货物跨境流动成本叠加作用的结果。在上述机制作用下, RTA 带来的货物贸易自由化效果会同时作用于服务部门, 实现货物贸易和服务 (尤其是中间投入服务) 贸易自由化的联动。基于此, 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研究假说 2: GVC 分工下货物贸易政策对服务贸易存在外溢效应, RTA 会通过削减货物贸易壁垒达到降低服务贸易成本的效果。这是 RTA 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间接途径。

尽管 RTA 会同时带来货物和服务贸易成本的下降, 但是 RTA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与货物贸易自由化效果存在差异, 体现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具有非对称性的特征 (Lee, 2019^[28])。RTA 的货物贸易谈判多采用互惠对等减税等方式, 因此相对而言 RTA 货物贸易自由化效果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是对称的。但是, RTA 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对两类国家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原因在于, 发达国家本身服务业竞争力比较强, 服务业市场准入水平也比较高, 因此发达国家降低服务贸易壁垒不会对自身服务业和制造业产生太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却可以通过降低服务贸易壁垒, 促进发达国家的优质服务要素进入, 使本国的中间品生产获得更优的服务配置 (刘斌等, 2020^[29]), 因此获益会更多。

推论: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 与发达国家签订 RTA 会从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中获得更多收益。

三、实证设计

(一) 模型设定

构建如下扩展的引力模型考察 RTA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

$$stc_{ijkt} = \alpha_0 + \alpha_1 RTA_{ij} + \alpha_2 stria_{ijkt} + \alpha_3 stria_{ijkt} \times stria_{ikt} + \alpha_4 stria_{ijkt} \times stria_{ikt} + \alpha_5 Z_{ij} + \delta_k + \eta_{it} + \mu_{jt} + \theta_{ijkt} \quad (1)$$

(1) 式中, stc_{ijkt} 表示 t 年 i 国和 j 国 k 行业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 RTA_{ij} 为与区域贸易协定有关的变量。考虑到两国间监管分歧和服务贸易限制程度也是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重要因素, 借鉴 Nordås (2016)^[30] 的做法, 将两国的监管分歧指数 $stria_{ijkt}$ 及其与贸易双方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相互项 $stria_{ijkt} \times stria_{ikt}$ 和 $stria_{ijkt} \times stria_{ikt}$ 同时引入模型。虚拟变量 Z_{ij} 主要涉及引力模型变量, 包括两国地理距离的对数 $ln dist_{ij}$,

共同边界 *contig*，共同语言 *comlang* 以及是否存在殖民附庸关系 *colony*。 δ_k 代表行业固定效应， η_{it} 和 μ_{it} 分别为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进口国-时间固定效应， θ_{ijkt} 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服务贸易成本

假设国家间偏好是一致的，这意味着各国不同服务行业 k 之间的替代弹性 σ^k 是一样的。基于 Anderson and Wincoop (2003)^[31] 构建结构引力模型：

$$X_{ij}^k = \frac{Y_i^k Y_j^k}{Y^k} \left(\frac{t_{ij}^k}{P_j^k \Pi_i^k} \right)^{1-\sigma^k} \quad (2)$$

其中， X_{ij}^k 表示国家 i 向国家 j 服务业 k 部门的出口， Y_i^k 是国家 i 服务业 k 部门的总出口， Y_j^k 是国家 j 服务业 k 部门的总进口， Y^k 表示全世界服务业 k 部门的总产出。 $t_{ij}^k \geq 1$ 表示国家 i 和国家 j 之间服务业 k 部门双边贸易成本。同时双边贸易还受到与其他贸易伙伴贸易成本的影响，表示为两个多边阻力项 (Multilateral Resistance Term)：

$$(\Pi_i^k)^{1-\sigma^k} = \sum_j \left(\frac{t_{ij}^k}{P_j^k} \right)^{1-\sigma^k} \frac{Y_j^k}{Y^k}, (P_j^k)^{1-\sigma^k} = \sum_i \left(\frac{t_{ij}^k}{\Pi_i^k} \right)^{1-\sigma^k} \frac{Y_i^k}{Y^k} \quad (3)$$

Π_i^k 表示对外多边阻力，是由国家 i 服务业 k 部门作为出口方负担的双边贸易成本。 P_j^k 表示对内多边阻力，是由国家 j 服务业 k 部门作为进口方负担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Novy (2013)^[32] 在 Anderson and Wincoop (2003) 的基础上改进了贸易成本的计算方法：

$$\tau_{ij}^k = \left(\frac{t_{ij}^k t_{ji}^k}{t_{ii}^k t_{jj}^k} \right)^{\frac{1}{2}} - 1 = \left(\frac{X_{ii}^k X_{jj}^k}{X_{ij}^k X_{ji}^k} \right)^{\frac{1}{2(\sigma-1)}} - 1 \quad (4)$$

进一步地，用上标 m 表示中间投入服务，上标 f 表示最终需求服务。将双边中间投入服务和最终需求服务的贸易成本写为：

$$\tau_{ij}^m \equiv \left(\frac{t_{ij}^m t_{ji}^m}{t_{ii}^m t_{jj}^m} \right)^{\frac{1}{2}} - 1 = \left(\frac{X_{ii}^m X_{jj}^m}{X_{ij}^m X_{ji}^m} \right)^{\frac{1}{2(\sigma-1)}} - 1 \quad (5)$$

$$\tau_{ij}^f \equiv \left(\frac{t_{ij}^f t_{ji}^f}{t_{ii}^f t_{jj}^f} \right)^{\frac{1}{2}} - 1 = \left(\frac{X_{ii}^f X_{jj}^f}{X_{ij}^f X_{ji}^f} \right)^{\frac{1}{2(\sigma-1)}} - 1 \quad (6)$$

本文计算中间投入服务和最终需求服务贸易成本所需的数据，均来自 OECD 结构分析统计 (Structural Analysis Statistics, 简称 STAN) 数据库中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 (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Tables, 简称 ICIOs)。国家间投入产出表的优势在于它区分了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还提供了各经济体服务部门国内销售以及贸易额。本文参照借鉴 Park (2002)^[33] 的做法，令 $\sigma = 5.6$ 。为了简洁，假设不同行业中间投入服务和最终需求服务之间的替代弹性是一样的^①。

①当考察的是贸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或双边贸易的变化时，替代弹性 σ 的值并不重要 (Novy, 2013)。

2. 核心解释变量：RTA 相关变量

与 RTA 有关的变量涉及 rt_a , $plus$ 以及 x 三个维度。变量 rt_a 是虚拟变量, 如果两国之间签订有 RTA, 则取值为 1, 否则为 0。考虑到 RTA 中的承诺内容不尽相同, 设置虚拟变量的做法只能体现 RTA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平均效应, 而无法体现 RTA 在议题范围和质量上的异质性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差异化影响。因此, 采用 RTA 深度指标刻画不同质量 RTA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异质作用。令 $plus$ 表示 RTA 中包含的“WTO+”议题总数, 反映边境措施深度; x 表示 RTA 中包含的“WTO-X”议题总数, 反映边境后措施深度。

表 1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变量		预期符号	变量含义	数据来源
RTA_{ijt}	$rt_{a_{ijt}}$	-	两国是否缔结区域贸易协定	Word Bank Deep RTA Database
	$plus_{ijt}$	-	RTA 边境措施深度	Word Bank Deep RTA Database
	x_{ijt}	-	RTA 边境后措施深度	Word Bank Deep RTA Database
$stria_{ijkt}$		+	两国的监管分歧指数	OECD STRI Database
$strio_{ikt}$		-	i 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OECD STRI Database
$strid_{jkt}$		-	j 国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OECD STRI Database
$Indist$		+	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CEPII 数据库
$contig$		-	共同边界虚拟变量	CEPII 数据库
$comlang$		-	共同语言虚拟变量	CEPII 数据库
$colony$		-	是否存在殖民附属关系虚拟变量	CEPII 数据库

3. 控制变量

(1) 服务贸易限制指数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简称 STRI)。鉴于 OECD STRI 构建的贸易限制评估框架没有考虑 RTA 中包含的任何具体减让 (Nordås, 2016), 因此能够剥离 RTA 的影响, 同时更适合评估以国内规制为代表的边境后措施的限制程度 (齐俊妍和高明, 2018^[34])。因此, 选择 OECD STRI 数据库作为服务贸易限制指数的来源。(2) 监管分歧指数。服务贸易监管分歧指数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Heterogeneity, 简称 STRIH) 数据来自 OECD STRI 数据库。该数据库构建国家间边境后措施的限制差异性指标有两种原则, 一种是基于“答案 (Answer)”原则。第二种是基于“得分 (Score)”原则。为了更加充分的考虑国家间的差异, 选择基于“得分 (Score)”的监管分歧指数。

4. 其他控制变量

(1) 地理距离。地理距离对服务贸易的影响更多的体现为获取信息的难易程度上。地理距离越大获取目标市场信息的难度越大, 贸易成本越高。(2) 是否拥有

共同边界。若进出口国互为邻国,则两国在地域文化、风俗习惯、历史传统和消费偏好上存在相似性,应可以降低信息获取成本、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3)是否使用共同语言。如果两国有共同语言,可以降低语言壁垒,方便实时交流,在服务贸易磋商、合同签订、履约沟通、服务产品交接和交易纠纷处理上能提高便捷性和效率,从而降低服务贸易成本。(4)是否存在殖民附庸关系。若两国有殖民附庸的关系,则可能存在相似的历史传统,会增强两国的亲切感,增加两国间的人员流动和贸易往来,有利于降低市场开拓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等。以上变量的数据均来自 CEPII 数据库。

(三) 数据说明

OECD 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提供了 2005—2015 年 64 个经济体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OECD STRI 数据库提供了 2014—2019 年 46 个经济体(包括 36 个 OECD 成员国^①和 10 个非 OECD 成员国^②)的 STRI 指数和 STRIH 指数。由于 ICIO 的行业分类与 STRI 的行业分类并不完全匹配^③,将住宿餐饮(D55T56)以及房地产(D68)两个行业从样本中剔除。因此,本文的样本涵盖 46 个经济体和 8 个服务业部门,样本期间为 2014—2015 年,样本总量 16560 个。

四、基准回归

(一) 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 RTA 对服务贸易成本影响的估计结果。从第(1)列可以看到,对于变量 rt_a 而言,回归系数虽为负但是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缔结 RTA 对经济体国家双边服务贸易成本没有显著的影响。换言之,签订 RTA 的国家组合的服务贸易成本并没有显著低于没有签订 RTA 的国家组合。可能的原因是:第一,服务贸易区别于货物贸易,不仅涉及市场准入还涉及国内监管,因此 RTA 中涉及国内监管领域的边境后措施作为制度型公共产品,会使 RTA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外溢到非缔约方,弱化 RTA 对缔约方之间服务贸易成本的削减效果;第二,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伴随着国内改革,一国往往已经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才有能力对接 RTA 有关规则,因此 RTA 签订后带来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会较为有限,反而会作为工具用来锁定国内改革的效果(Miroudot 和 Shepherd, 2014)。

为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 RTA 议题设置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差异化影响。表 2 中第(2)、(3)列引入 $plus$ 和 x 两个变量,结果显示上述两个变量前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提高 RTA 中的边境措施深度、边境后措施深度将显著降低双边服务贸易成本。(1) — (3) 列 $strih$ 前系数显著为正, $strih$ 与贸易双方 $stri$ 的交互项系

①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

②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俄国、南非、泰国。

③对此的处理方法是对同属于一个 ICIO 服务业分类的不同细分行业的 STRI 取平均值,作为该类行业的服务贸易限制程度指标。

数显著为负，在综合考虑直接影响效应和交互项的偏效应后，*stih* 前的系数依然为正，表明监管分歧会提升服务贸易成本。对于引力模型变量而言，地理距离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距离仍是服务贸易成本的主要影响因素。共同边界对降低服务贸易成本的作用则不明显。共同语言和是否存在殖民附属关系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 2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i>rta</i>	-0.080 (-1.389)		
<i>plus</i>		-0.022*** (-4.449)	
<i>x</i>			-0.006** (-2.024)
<i>stih</i>	1.797*** (3.319)	1.698*** (3.134)	1.787*** (3.304)
<i>stih</i> × <i>strio</i>	-2.886*** (-4.346)	-2.802*** (-4.217)	-2.879*** (-4.333)
<i>stih</i> × <i>strid</i>	-4.534*** (-6.692)	-4.437*** (-6.550)	-4.515*** (-6.666)
<i>contig</i>	0.444*** (4.894)	0.418*** (4.611)	0.442*** (4.867)
<i>comlang</i>	-0.199*** (-2.676)	-0.214*** (-2.887)	-0.210*** (-2.834)
<i>colony</i>	-0.844*** (-9.024)	-0.858*** (-9.235)	-0.832*** (-8.940)
<i>Indist</i>	1.382*** (40.699)	1.349*** (41.508)	1.392*** (45.934)
常数项	-5.977*** (-19.952)	-5.594*** (-19.775)	-6.057*** (-23.832)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R ²	0.700	0.700	0.700
观测量	16 560	16 560	16 560

注：***、**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内为 t 统计值。

(二) 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的讨论与处理

现实中几乎所有影响国家间缔结 RTA 的经济和政治因素都会同时对双边贸易流量产生影响 (Baier 和 Bergstrand, 2004^[35])，贸易成本作为利用贸易流量计算出的事后变量也会受到影响。就本研究而言，地理距离、制度差异以及双边贸易规模等双边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也会影响到双方是否缔结 RTA，从而导致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造成内生性问题。

为了缓解内生性偏误对模型估计造成的偏差，本文采用如下两种方法构建工具

变量。一是,参考 Baier 和 Bergstrand (2004) 选取两国与其他国家的距离 (*remote*)^① 作为工具变量。地理距离是前定变量,不随其他因素变化,满足外生性要求。同时,在两国地理距离给定的情况下,若两国同其他贸易伙伴的距离越远,则两国之间贸易的依赖性更强,更有可能签订 RTA,满足相关性要求。二是,借鉴林僖 (2021) 的做法,选取贸易双方是否存在 RTA 共同缔约方及其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贸易双方存在 RTA 共同缔约方,也即至少有一个经济体与贸易双方均签订有 RTA。一方面,这可能源于贸易双方均与共同缔约方地理临近,也就意味着贸易双方地理临近,签订 RTA 可能性大。另一方面,考虑到特定经济体能够接受的 RTA 存在较强的相似性,不会因缔约伙伴的差异而出现根本差异。因此共同缔约方的存在意味着贸易双方可以接受的 RTA 议题和条款近似,二者之间签订 RTA 有较好的共识基础,签订 RTA 的可能性大。而共同缔约方越多,这种地域上的集聚效应和文本上的模板效应就会越明显,会进一步通过 RTA 的多米诺效应 (WTO, 2011^[36]) 促使贸易双方签订 RTA。因此,满足相关性要求。与此同时,贸易双方是否拥有共同的 RTA 缔约方及其数量与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并不直接相关,满足与误差项不相关的假定。

表 3 内生性检验

变量	<i>remote</i>			是否存在共同缔约方		
	(1)	(2)	(3)	(4)	(5)	(6)
<i>rta</i>	-0.705 *** (-3.658)			-1.754 *** (-6.403)		
<i>plus</i>		-0.069 *** (-3.668)			-0.154 *** (-6.446)	
<i>x</i>			-0.056 *** (-3.628)			-0.189 *** (-5.63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617.432 [0.0000]	532.560 [0.0000]	350.543 [0.0000]	257.923 [0.0000]	276.130 [0.0000]	82.472 [0.0000]
Kleibergen-Paap rk F 统计量	896.098 {16.38}	693.142 {16.38}	384.959 {16.38}	345.175 {16.38}	363.190 {16.38}	89.477 {16.38}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493.061 {16.38}	1141.943 {16.38}	493.082 {16.38}	759.697 {16.38}	736.730 {16.38}	139.217 {16.38}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698	0.699	0.694	0.686	0.688	0.621
观测量	16 560	16 560	16 560	16 560	16 560	16 560

注: () 内为 t 统计值, [] 内的值为相应统计量的 P 值, { } 内的值为 Stock-Yogo 检验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

上述两个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表 3 的第 (1) 至 (6) 列^②。可以看出,与基准回归相比,*rta* 前的系数变得显

①计算方法详见 Baier 和 Bergstrand (2004)。

②限于篇幅,将共同缔约方数量作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没有汇报在正文中,备案。

著,表明控制内生性后 RTA 对服务贸易成本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时,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Kleibergen-Paap rk F 统计量以及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均证明选择的工具变量都是合理有效的。

2. 遗漏变量和计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采取是否为欧盟成员国 (*both_ EU*) 和是否为同一关税同盟 (*CU*) 这两个时变双边国家因素,用以控制其他时变服务贸易成本影响因素,估计结果见表 4 第 (1) — (3) 列。结果显示, RTA 相关变量前的估计系数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结论稳健。鉴于误差项的异方差性会导致标准误差和参数估计的不一致,表 4 第 (4) — (6) 列采用泊松伪极大似然 (PPML) 估计代替 OLS 方法做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表 4 遗漏变量和 PPML 法

变量	遗漏变量			PPML		
	(1)	(2)	(3)	(4)	(5)	(6)
<i>rta</i>	-0.014 (-0.238)			-0.006 (-0.638)		
<i>plus</i>		-0.013 *** (-2.612)			-0.002 *** (-2.586)	
<i>x</i>			-0.005 * (-1.676)			-0.001 * (-1.785)
<i>both_ EU</i>	-0.577 *** (4.474)	-0.570 *** (4.433)	-0.590 *** (4.583)			
<i>CU</i>	-0.984 *** (-7.429)	-0.923 *** (-6.895)	-0.983 *** (-7.55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i>PseudoR</i> ²				0.316	0.316	0.316
观测量	16 560	16 560	16 560	16 560	16 560	16 560

注:限于篇幅,本表只罗列了 RTA 相关变量系数的回归结果,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省略,备案。下同。

3. 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选择将制度距离 (*indis*) 作为监管分歧指数 (*strij*) 的替代变量,采用贸易双方监管质量 (Regulatory Quality, 简称 RQ) 差异的绝对值对其加以衡量。监管质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治理指数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ex, 简称 WGI) 数据库^①。表 5 第 (1) — (3) 列展示了将制度距离作为 *strij* 的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 5 第 (4) 列选择将贸易协定设计 (Design of Trade Agreements, 简称 DESTA)^② 数据库中提供的 *depth* 指标作为反映 RTA 深度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一致,结论稳健。

① <https://datacatalog.worldbank.org/dataset/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

② 数据来源: <https://www.designoftradeagreements.org/>。由于该数据库仅提供 RTA 整体深度,因此无法区分边境措施深度 *plus* 和边境后措施深度 *x*。

表5 替代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i>indis</i> 作为 <i>stih</i> 替代变量		<i>depth</i> 指标作为 <i>RTA</i> 深度替代变量	
	(1)	(2)	(3)	(4)
<i>rta</i>	-0.093 (-1.621)			
<i>plus</i>		-0.022*** (-4.643)		
<i>x</i>			-0.006** (-2.036)	
<i>depth</i>				-0.060*** (-6.425)
<i>stih</i>	0.229*** (2.643)	0.242*** (2.790)	0.227*** (2.621)	1.681*** (3.119)
<i>stih</i> × <i>strio</i>	-0.631*** (-2.960)	-0.644*** (-3.021)	-0.629*** (-2.952)	-2.828*** (-4.263)
<i>stih</i> × <i>strid</i>	-0.533*** (-2.911)	-0.545*** (-2.978)	-0.511*** (-2.799)	-4.413*** (-6.527)
<i>contig</i>	0.433*** (4.756)	0.409*** (4.492)	0.433*** (4.757)	0.407*** (4.505)
<i>comlang</i>	-0.207*** (-2.787)	-0.221*** (-2.980)	-0.217*** (-2.938)	-0.196*** (-2.643)
<i>colony</i>	-0.828*** (-8.854)	-0.841*** (-9.059)	-0.815*** (-8.753)	-0.873*** (-9.435)
<i>lndist</i>	1.390*** (41.749)	1.356*** (42.791)	1.403*** (48.022)	1.340*** (42.460)
常数	-6.034*** (-20.191)	-5.667*** (-20.091)	-6.148*** (-24.183)	-5.460*** (-20.465)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R ²	0.699	0.700	0.699	0.701
观测量	16 560	16 560	16 560	16 560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内为t统计值。

五、拓展分析与机制检验

(一) 异质性分析

1. 区分服务类型

表6分别考察了RTA对不同类型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RTA对最终需求服务成本的影响与总服务贸易成本比较类似。相比之下，RTA对于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更大，体现在：第一，对于中间投入服务，*rta*、*plus*和*x*前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签订RTA并且提高RTA深度能够显著降低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第二，从政策有效性来看，边境后措施对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对最终需求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通过对比第(3)和(6)列，表明增加“边境后措施”议题深度能更加有效降低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

表6 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区分服务用途

变量	最终需求服务			中间投入服务		
	(1)	(2)	(3)	(4)	(5)	(6)
<i>rta</i>	-0.083 (-1.224)			-0.173** (-2.508)		
<i>plus</i>		-0.024*** (-4.096)			-0.026*** (-4.535)	
<i>x</i>			-0.006* (-1.879)			-0.009*** (-2.8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R ²	0.714	0.714	0.714	0.574	0.574	0.574
观测量	16 560	16 560	16 560	16 560	16 560	16 560

2. 区分 RTA 类型

按照缔约方经济发展水平将 RTA 分为北北 (NN) 型、南北 (NS) 型以及南南 (SS) 型。各类型 RTA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效果详见表 7。从表中可以看到, 不同类型 RTA 对服务贸易成本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首先, NN 型和 NS 型 RTA 都会显著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无论是增加边境措施或边境后措施的深度都会对服务贸易成本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第二, NN 型 RTA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强于 NS 型, 表现为 NN 型 RTA 相关变量前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 NS 型, 说明 RTA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存在非对称性, 印证了推论; 第三, SS 型 RTA 不能削减服务贸易成本。可能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缔结的部分 RTA 并不以显著的贸易自由化作为特征。缔结 RTA 的目的不只局限于追求贸易创造等传统经济收益, 还包括对抗第三方威胁、增强国际话语权、巩固国内改革成果、锁定贸易自由化方向、保持政策连贯性等非传统利益 (周念利, 2012)。以上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 发展中国家应更多的选择发达经济体作为贸易协定伙伴, 以更好的发挥 RTA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

表7 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区分 RTA 类型

变量	NN	NS	SS
	(1)	(2)	(3)
<i>rta</i>	-0.648*** (-6.168)	-0.520*** (-5.837)	1.246*** (8.692)
<i>plus</i>	-0.062*** (-8.804)	-0.033*** (-4.357)	0.082*** (5.299)
<i>x</i>	-0.032*** (-7.778)	-0.009** (-2.092)	0.038*** (4.54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量	5 616	8 208	2 736

(二) 影响机制

1. 减少监管分歧

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RTA 能否通过弥合监管分歧来达到降低服务贸易成本的效果, 结果如表 8 所示。第 (1) — (3) 列的结果表明, 对于 NN 型 RTA, 无论边境措施还是边境后措施深度的增加都可以通过减小监管分歧降低最终需求服务贸易成本。但是对于中间投入服务, 唯有边境措施能够通过减小监管分歧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从第 (5) 列可以看到, 只有边境后措施才能显著降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监管分歧。第 (6) 列中 *stria* 前的系数也为负, 表明 NS 型 RTA 通过降低监管分歧以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中介效应不成立^①。可能的解释是: 第一, 尽管 NS 型 RTA 有较高的边境后措施深度^②, 但是由于缺少法律可执行性 (legal enforceability), 导致 NS 型在减少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成员国之间监管分歧上的效果较

表 8 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机制: 减少监管分歧

服务类型/变量	NN			NS		
	(1)	(2)	(3)	(4)	(5)	(6)
最终需求服务	<i>stc_fin</i>	<i>stria</i>	<i>stc_fin</i>	<i>stc_fin</i>	<i>stria</i>	<i>stc_fin</i>
<i>plus</i>	-0.064*** (-7.119)	-0.001*** (-5.575)	-0.061*** (-6.773)	-0.039*** (-3.914)	-0.000 (-1.126)	-0.040*** (-3.937)
<i>stria</i>			3.521*** (2.917)			-1.418 (-1.433)
<i>x</i>	-0.034*** (-6.567)	-0.000** (-2.018)	-0.033*** (-6.369)	-0.010** (-2.012)	-0.000*** (-3.119)	-0.011** (-2.066)
<i>stria</i>			3.875*** (3.229)			-1.368 (-1.375)
中间投入服务	<i>stc_inter</i>	<i>stria</i>	<i>stc_inter</i>	<i>stc_inter</i>	<i>stria</i>	<i>stc_inter</i>
<i>plus</i>	-0.065*** (-9.824)	-0.001*** (-5.575)	-0.063*** (-9.466)	-0.029*** (-3.435)	-0.000 (-1.126)	-0.030*** (-3.458)
<i>stria</i>			2.900*** (3.358)			-0.901 (-1.039)
<i>x</i>	-0.029*** (-6.499)	-0.000** (-2.018)	-0.029*** (-6.299)	-0.008* (-1.674)	-0.000*** (-3.119)	-0.008* (-1.727)
<i>stria</i>			3.318*** (3.836)			-0.861 (-0.99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5 616	5 616	5 616	8 208	8 208	8 208

①为了更好的识别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分别采用 Sobel 法和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均表明 NS 型 RTA 通过降低监管分歧以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中介效应确实是不成立的。

②NN 型 RTA 边境后措施议题的平均深度分别为 9.09, 而 NS 型 RTA 边境后措施议题的平均深度为 9.64。

为有限^①；第二，由于受到数据可获得性影响，本文的样本区间仅有2014、2015两个年份，而RTA缩减制度距离的效果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实现，因此抑制了这一机制的实现。

2. 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外溢效应

这部分利用中间品货物贸易成本 (*inter_gtc*)^② 作为中介变量，考察货物贸易自由化政策效果对服务贸易的外溢效应作为RTA影响服务贸易成本途径的有效性，估计结果详见表9。第(1) — (3)列的结果表明，NN型RTA可以通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带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从第(5)列可以看到，提高NS型RTA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深度都可以显著降低中间品贸易成本。第(6)列在同时加入RTA深度指标和中间品贸易成本后，*plus*和*x*前的系数由第(4)列的显著为负变为不显著，意味着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被货物贸易自由化完全吸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货物贸易自由化是NS型RTA降低服务贸易成本的唯一途径。

表9 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机制：货物贸易自由化

服务类型/变量	NN			NS		
	(1)	(2)	(3)	(4)	(5)	(6)
最终需求服务	<i>stc_fin</i>	<i>inter_gtc</i>	<i>stc_fin</i>	<i>stc_fin</i>	<i>inter_gtc</i>	<i>stc_fin</i>
<i>plus</i>	-0.061 *** (-6.773)	-0.021 *** (-19.948)	-0.020 ** (-2.263)	-0.040 *** (-3.937)	-0.017 *** (-16.606)	-0.011 (-1.123)
<i>inter_gtc</i>			2.008 *** (13.112)			1.703 *** (11.380)
<i>x</i>	-0.033 *** (-6.369)	-0.011 *** (-18.875)	-0.011 ** (-2.215)	-0.011 ** (-2.066)	-0.006 *** (-11.849)	0.000 (0.016)
<i>inter_gtc</i>			2.022 *** (13.230)			1.734 *** (11.663)
中间投入服务	<i>stc_inter</i>	<i>inter_gtc</i>	<i>stc_inter</i>	<i>stc_inter</i>	<i>inter_gtc</i>	<i>stc_inter</i>
<i>plus</i>	-0.063 *** (-9.466)	-0.021 *** (-19.948)	-0.015 ** (-2.286)	-0.030 *** (-3.458)	-0.017 *** (-16.606)	0.009 (1.073)
<i>inter_gtc</i>			2.309 *** (13.886)			2.336 *** (10.871)
<i>x</i>	-0.029 *** (-6.299)	-0.011 *** (-18.875)	-0.003 (-0.738)	-0.008 * (-1.727)	-0.006 *** (-11.849)	0.007 (1.505)
<i>inter_gtc</i>			2.356 *** (14.487)			2.336 *** (11.08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量	5 616	5 616	5 616	8 208	8 208	8 208

①原因在于虽然发达国家有较为强烈的规制融合意愿，但是实际谈判过程中往往会作出妥协，放松监管一致性要求，用政策空间换取时间，以求协议尽快达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中就搁置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中对富有争议的条款，设置暂停条款，初衷是为了敦促协定的尽快达成并换取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白洁和苏庆义，2019^[37]）。

②计算方法与本文计算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类似，仅是将服务部门替代为制造业部门，并令弹性为8。数据源于OECD的ICIO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GVC 分工赋予 RTA 服务贸易政策效果新的维度和属性。那么, GVC 背景下 RTA 能否以及如何降低服务贸易成本成为本研究的出发点。经验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 签订 RTA 对总服务贸易成本存在抑制作用但不显著, 提高 RTA 边境措施和边境后措施的深度将显著强化 RTA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 第二, RTA 对最终需求和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表现在 RTA 对最终需求服务贸易成本没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但是却可以显著降低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 提高 RTA 深度对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有更好的削减效果; 第三, RTA 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存在非对称性, NN 型 RTA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效果强于 NS 型; 第四, NN 型 RTA 可以同时通过减少监管分歧和货物贸易自由化两个途径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而货物贸易自由化对服务贸易的外溢效应是 NS 型 RTA 降低服务贸易成本的唯一途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丰富的政策启示: 第一, 中国应该积极参与高质量 RTA 谈判, 同时从最大化 RTA 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角度看, 中国应该选择发达国家作为 RTA 谈判伙伴, 不要回避短期内对国内制度空间造成挤压, 但长期却有利于中国实现高质量开放的高标准条款, 着重在与发达国家的 RTA 中提高边境后措施深度, 以增强 RTA 对服务贸易成本的削减效果; 第二, 进一步提高营商环境质量, 加快对接高水平开放的步伐, 抑制监管分歧对 RTA 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的抵消作用; 第三, 重视中间投入服务在 GVC 分工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提高 RTA 深度, 进一步削减货物贸易壁垒, 充分发挥 RTA 货物贸易自由化对服务贸易的外溢效应, 提升获得中间投入服务的自由化程度, 实现价值链地位的巩固和攀升。

[参考文献]

- [1] Horn H., P. C. Mavroidis and A. Sapir. Beyond the WTO? An Anatomy of EU and U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J]. *The World Economy*, 2010, 33 (11): 1565-1588.
- [2] Mattoo A, Nadia R, Michele R. *Handbook of Deep Trade Agreement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20.
- [3] Baldwin R. 21st Century Regionalism: Filling the gap between 21st century trade and 20th century trade rules [J]. WTO Working Paper, 2011, No. ERS-2011-08.
- [4] Miroudot S, Shepherd B. The Paradox of Preference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and Trade Costs in Services [J]. *World Economy*, 2014, 37 (12): 1751-1772.
- [5] WTO. *World Trade Report: The Future of Services Trade* [R], 2019.
- [6] Cernat L, Kutlina-Dimitrova Z. Thinking in a Box: A Mode 5 Approach to Service Trade [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14, 48 (6): 1109-1126.
- [7] Beverelli C., Fiorini M. and Hoekman B. Services trade policy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4: 166-182.
- [8] 张艳, 唐宜红, 周默涵. 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否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 [J]. *世界经济*, 2013 (11): 51-71.
- [9] Hoekman B. *Facilitating Trade in Services* [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228. World Bank, 2020.

- [10] 孙浦阳, 侯欣裕, 盛斌. 服务业开放、管理效率与企业出口 [J]. 经济研究, 2018, 053 (007): 136-151.
- [11] 刘斌, 魏倩, 吕越, 祝坤福. 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升级 [J]. 经济研究, 2016 (3): 151-162.
- [12] 王岚. 投入服务化是否提高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0 (2): 29-43.
- [13] 戴翔, 李洲, 张雨. 服务投入来源差异、制造业服务化与价值链攀升 [J]. 财经研究, 2019, 45 (05): 30-43.
- [14] Marchetti, J. A. Do Economic Integration Agreements Lead to Deeper Integration of Services Market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Integration: Factor Mobility, Agriculture, Environment and Quantitative Studies*, 2011, 3: 435.
- [15] 周念利. 缔结“区域贸易安排”能否有效促进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出口 [J]. 世界经济, 2012, 35 (11): 88-111.
- [16] Guillin A. Trade in Services and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Do Negotiations on Services Have to be Specific? [J], *World Economy*, 2013, 36 (11): 1406-1423.
- [17] 陈丽丽, 龚静.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制度因素与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研究——基于49国之间双边服务贸易流量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4 (11): 132-143.
- [18] 林僊, 鲍晓华.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与服务出口二元边际——基于国际经验的实证分析 [J]. 经济学 (季刊), 2019 (4): 18.
- [19] 林僊.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出口的影响: 机制与效应 [J]. 世界经济, 2021 (6): 50-71.
- [20] 裴长洪, 杨志远, 刘洪愧.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分析 [J]. 财贸经济, 2014 (12): 5-16+63.
- [21] 刘洪愧. 区域贸易协定对增加值贸易关联的影响——基于服务贸易的实证研究 [J]. 财贸经济, 2016 (8): 127-143.
- [22] 林僊, 鲍晓华.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服务贸易流量? ——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视角 [J]. 经济研究, 2018, 53 (01): 169-182.
- [23] Miroudot S., J. Sauvage and M. Sudreau. *Multilateralising Regionalism: How Preferential are Services Commitments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 OECD Publishing, 2010.
- [24] 龚静, 尹忠明. 国际服务贸易成本影响因素分析——基于40个经济体面板数据的研究 [J]. 商业研究, 2017 (05): 93-99.
- [25] Miroudot, S. and B. Shepherd. 2016. “Trade Cost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in Services,” in M. Roy and P. Sauvé (eds.), *Research Handbook on Trade in Services*. Edward Elgar.
- [26] Kox H, Nordås H K. *Services Trade and Domestic Regulation* [R].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2007, No. 49.
- [27] Egger P H, Larch M, Nigai S, Yotov Y V. *Trade Costs in the Global Economy: Measurement, Aggregation and Decomposition* [R].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ERS-2021-2, 2021.
- [28] Lee W.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and GVC Participation; New evidence for Heterogeneous Effects by Income Level and Provision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27 (3): 888-915.
- [29] 刘斌, 赵晓斐.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 服务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J]. 经济研究, 2020 (7): 159-174.
- [30] Anderson J E, Van Wincoop. 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 93 (1): 170-192.
- [31] Nordås H K. *Services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the Trade Effect of Regulatory Differences* [R].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No. 189, 2016.
- [32] Novy D. Gravity Redux: Measur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s with Panel Data [J]. *Economic Inquiry*, 2013, 51 (1): 101-121.
- [33] Park S C. *Measuring Tariff Equivalents in Cross-Border Trade in Services* [R].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02-15, 2002.

- [34] 齐俊妍, 高明. 服务贸易限制的政策评估框架及中美比较——基于 OECD-STRI 数据库的分析 [J]. 国际经贸探索, 2018, 34 (01): 4-18.
- [35] Baier S L. Bergstrand J. H. and Mariutto R.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revisited: distinguishing sources of interdependence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4, 22 (1): 31-58.
- [36] WTO. World Trade Report: The WTO and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R], 2011.
- [37] 白洁, 苏庆义. CPTPP 的规则, 影响及中国对策: 基于和 TPP 对比的分析 [J]. 国际经济评论, 2019 (1): 58-76.

(责任编辑 于友伟)

Doe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educe Service Trade Costs in Global Value Chains?

WANG Lan

Abstract: The role of servic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e new form of service trade has enriched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RTA) affect the cost of service trad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and mechanism of RTAs on the trade cos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ervices from intermediate input and final demand. The results indicates that just signing RTAs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decreasing effect on the cost of trade in services, and increasing the depth of RTAs will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ost of service trade. RTA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trade cost of intermediate input services, while have no obvious effect on that of final demand services. NN-type RTAs have a stronger decreasing effect on the cost of service trade than NS-type RTAs. Reducing regulatory differences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goods trade liberalization are two channels for NN-type RTAs influencing the service trade costs, while NS-type RTAs can only reduce the service trade costs through the goods trade liberalization. Therefore, China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negotiation of high-quality RTAs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facilitation of service trade of RTAs through improving the depth of RTAs.

Keywords: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Cost of Trade in Services; Border Measures; Behind Border Measures; Regulatory Differences